

营商环境、创新活跃度与企业高质量发展

张兆国^{1,2,3}, 徐雅琴¹, 成娟¹

(1. 武汉工商学院管理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65;

2. 湖北省数字商务与管理优势特色学科群, 湖北 武汉 430065;

3. 湖北省商务服务发展研究中心, 湖北 武汉 430065)

摘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如何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是颇受政界、商界和学界关注的重大战略性问题。以 2013—2022 年沪深两市 A 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数据, 采用主效应模型与中介效应模型分别考察营商环境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以及创新活跃度在这种影响中的传导作用。研究结果表明: 政府改善营商环境有助于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 创新活跃度在营商环境影响企业高质量发展中起到了积极的传导作用。进一步分析发现: 政务环境、市场环境、法治环境和对外开放环境对企业高质量发展均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 而公共服务环境对企业高质量发展有正向影响, 但不显著; 东部和中部地区的营商环境对企业高质量发展均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 而西部地区的营商环境对企业高质量发展有正向影响, 但不显著; 营商环境对民营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 而营商环境对国有控股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有正向影响, 但不显著; 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均有着显著的传导效应, 而外观设计专利的传导效应则不显著。这些研究结论对进一步改善我国营商环境、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 营商环境; 创新活跃度; 企业高质量发展

中图分类号: F27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0566(2024)01-0130-09

Business environment, innovation activity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ZHANG Zhaoguo^{1,2,3}, XU Yaqin¹, CHENG Juan¹

(1. School of Management, Wuhan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Wuhan 430065, China;

2. Hubei Province Digital Commerce and Management Advantaged Specialty Group, Wuhan 430065, China;

3. Hubei Business Service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Wuhan 430065, China)

Abstract: After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as entered a new era, how to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has become a major strategic issue that has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the political, business and academic communities. This paper uses the main effect model and the intermediary effect model to investigate the impact of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on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and the transmission role of innovation activity in this impact, and selects the A-share listed companies in China's capital market from 2013 to 2022 as sample data.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optimizing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can help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and innovation activity plays a positive role in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affecting the high-

收稿日期: 2023-10-11 修回日期: 2023-12-10

作者简介: 张兆国 (1955—), 男, 湖北宜昌人, 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院二级教授, 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武汉工商学院管理学院院长, 研究方向为公司资本结构、公司财权安排与公司治理结构。通信作者: 徐雅琴。

quality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Further analysis shows that government environment, market environment, legal environment and opening environment all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while the public service environment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but not significant;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in the eastern and central regions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while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in the western region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but it is not significant;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private listed companies, while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state-owned listed companies, but it is not significant; both invention patents and utility model patents have significant conduction effect, while design patents have no significant conduction effect. These conclusions have certain enlightenment significance for further improving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in China and promot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Key words: business environment; innovation activity;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一、问题提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所强调的,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是我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逻辑,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大局。企业作为市场经济的微观主体,其高质量发展无疑是实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要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就必须优化营商环境。正如2020年1月1日起国务院施行的《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所强调的那样,要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只有这样,才能打通经济循环的堵点,形成规范有序、公平竞争的体制机制,从而增强企业发展动力。因此,如何优化营商环境,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是近年来我国政府着力解决的重大战略性问题。

政府改善营商环境有着重要作用,是在资源配置中更好地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和政府宏观调控作用的制度基础。大量实证研究表明,政府改善营商环境对经济高质量发展^[1-2]、创新创业活动^[3-4]、全要素生产率提高^[5]以及企业研发投入^[6]方面都有着积极的影响作用。这些研究为政府不断改善营商环境提供了经验证据。但遗憾的是,缺乏系统考察其影响背后的作用渠道和作用机制。经济学中的因果关系研究范式认为,在考察特定原因对特定结果的影响时,要关注这一因果关系的作用渠道和作用机制^[7]。只有这样,才能打开营商环境影响其经济后果的“黑箱”。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以我国沪深两市2013—2022年间A股类非金融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考察营商环境对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以及创新活跃度在这种影响中的传导作用。研究发现,政府改善营商环境能够显著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创新活跃度在营商环境影响企业高质量发展中起到了积极的传导作用;进一步从创新活跃度的分类、营商环境的结构性和区域分布以及企业产权性质等方面考察政府改善营商环境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发现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

本文的贡献主要表现在如下3个方面:第一,现有研究对营商环境的衡量大都是采用市场化程度指标,不能全面反映营商环境的结构性和区域分布。而本文从政务环境、市场环境、法治环境、公共服务环境和对外开放环境等维度构建了一个指标体系,以综合反映营商环境的状况。这有助于进一步提高实证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和说服力。第二,现有研究在考察营商环境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时,对其影响机制的考察略显不足。本文根据经济学中的因果关系研究范式,考察了创新活跃度在营商环境影响企业高质量发展中的传导作用。这有助于进一步深化相关文献的研究。第三,现有研究在考察营商环境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时,鲜有考察其异质性问题。而本文从营商环境的结构性和区域分布以及企业产权性质等方面,考察了营商环境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在空间上所存在的异质性。这有助于为政府进一步改善营商环境,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丰富的

经验证据。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我国经过 40 多年的改革开放,成功地实现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从一个贫穷落后国家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其重要成功经验之一,就是同时推进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推进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实现政府职能从计划指令型向服务引导型转变,提高政府治理能力,从而为在资源配置中更好地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和政府宏观调控作用提供有效的制度环境。

从微观层面看,政府治理能力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营商环境。也就是说,营商环境是政府治理能力的微观表现形式,政府治理能力越强,企业营商环境就越好。营商环境是指企业从事创业、创新、融资、投资等活动所面临外部环境的综合性生态系统^[8],包括政务环境、市场环境、法治环境、公共服务环境、对外开放环境等内容^[9-10]。随着我国政府治理能力的不断提高,企业的营商环境得到了不断改善。据世界银行发布的《全球营商环境报告 2022》显示,中国营商环境在全球排名中已升至第 31 位,并连续两年列入全球改善营商环境幅度最大的十大经济体。

按照交易成本理论和制度理论,提高政府治理能力,改善营商环境对激励和约束企业行为,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有着积极的影响作用。费鲁博顿等^[11]认为,交易成本是指建立、使用、维持和改变制度所涉及的费用,并根据交易的类型把交易成本进一步分为 3 种情形。一是市场型交易成本,即为进行市场交易所发生的信息费用和谈判费用等;二是管理型交易成本,即一个组织在处理和维持其内部上级与下级、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关系所涉及的组织设计费用和组织运行费用等;三是政治型交易成本,即政党、政府和社会组织在公共品领域所发生的政治组织设计费用和政体运行费用等。按照制度理论,市场机制不健全和政府治理不完善均是产生这些交易成本的直接原因。因此,提高政府治理能力,改善营商环境既有助于

弥补市场不足,降低市场型交易成本,也有助于促使企业完善内部治理结构,降低管理型交易成本,还有助于抑制政府“非理性公共人行为”(如对企业的侵占、寻租、腐败和制度供给不足等),降低政治型交易成本。基于这一理论,本文认为政府改善营商环境可以使企业节约交易成本,增强风险承担能力,快速应对市场需求和商业环境的变化,实现高质量发展。相关研究也表明:夏后学等^[3]认为,政府改善营商环境有助于消除寻租的影响,促进企业市场创新;吴一平等^[12]认为,政府改善营商环境有助于公平竞争,抑制企业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得公共资源;高翔等^[13]认为,政府改善营商环境有助于改善政府补贴效果,提高企业风险承担水平;陈晓红^[14]、许和连等^[15]认为,政府改善营商环境有助于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提高企业绩效。

此外,从企业投资的预期和信心看,政府改善营商环境还有助于减少企业投资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为企业创造更多的投资机会和投资渠道^[16-19]。在这种良好的投资环境下,企业就能更好地把控投资风险,提振投资信心,加大投资力度,获得更大投资收益,实现高质量发展^[20-22]。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1:

假设 H₁:政府改善营商环境有助于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

但是,按照经济学中的因果关系研究范式,政府改善营商环境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需要通过一定的传导路径。因此,本文着重考察创新活跃度在这种影响中的传导作用。

一方面,如前文所述,根据交易成本理论和制度理论,政府改善营商环境既有助于企业化解政策的不确定性,降低投资风险,稳定投资预期^[23-24],也有助于企业缓解融资约束,拓宽融资渠道,为投资提供资金支持^[25],还有助于企业改善内部治理和内控建设,提高投资效率^[26-27]。因为,本文认为政府改善营商环境能够促进企业技术创新。

另一方面,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知识和创新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内生性因素,技术创新对经

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至关重要^[28]。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思想强调指出,创新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力^[29]。基于这些理论论断,本文认为,在当今面临着新一轮科技与产业革命的严峻挑战中,科技创新与进步无疑是第一生产力,是推动经济持续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

所以,综合以上两个方面的分析,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2:

假设 H₂:在营商环境影响企业高质量发展中,创新活跃度有着积极的传导作用。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 2013—2022 年沪深两市 A 股类非金融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并剔除数据缺失、* ST 和 ST 等公司,还对连续变量采用 1% 和 99% 水平的 Winsorize 缩尾处理。经过筛选,最终得到 2 801 个样本公司,20 508 条样本数据。本文的数据来源于 WIND、CSMAR、EPS、国家统计局官网以及《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地方政府效率研究报告》和 CNRDS 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并采取手工搜集。

(二)变量定义

1. 企业高质量发展,即被解释变量。目前,对该变量的测度主要有两种方法:一是采用单变量衡量方法,如全要素生产率^[30]、资产收益率^[31]、经济增加值^[32]等指标;二是采用多维度衡量方法,即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等维度,设计相应指标,构建综合指标体系^[33]。本文采用 LP 方法(指数估计法)测算的全要素生产率,作为衡量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变量。这是因为这个指标能够综合反映技术、制度、企业家才能、规模报酬、产业结构、对外开放等难以量化的因素对企业发展的贡献^[34]。

2. 营商环境,即解释变量。本文借鉴了李志军^[35]、邱康权等^[9]的做法。首先,从政务环境、市场环境、法治环境、公共服务环境和对外开放环境五个维度构建指标体系,如表 1 所示;然后,采用熵权 TOPSIS 法测度反映营商环境的综合指数,并扩大 100 倍,以减少与其他变量所存在的数量级差异。

表 1 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单位	属性
政务环境 (Government)	政府效率	政府服务效率	%	+
	政府支出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GDP	%	+
市场环境 (Market)	资本生产率	GDP/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	%	+
	劳动生产率	GDP/全社会从业人员数	元/万人	+
	经济增长	GDP 增速	%	+
	消费贡献度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GDP	%	+
	创新投入	科学支出/一般预算内支出	%	+
法治环境 (Law)	司法服务	律师事务所数量	个	+
	社会治安	万人刑事案件数	件/万人	+
	创新产出	专利授权数/常驻人口	件/万人	+
公共服务环境 (Public)	医疗服务	床位数/常驻人口	张/万人	+
	文化服务	公共图书馆图书总藏量/常驻人口	册/万人	+
	教育服务	教育支出/地方财政支出	%	+
	邮电服务	邮电业务总量/GDP	%	+
	金融服务	社会融资规模	亿元	+
对外开放环境 (Opening)	进出口贸易	海关进出口金额/GDP	%	+
	外企数量	外资直接投资企业数/企业总数	%	+

注:“属性”一列中“+”“-”分别表示正向、负向指标;“权重”一列根据下一节熵权法所得。

3. 创新活跃度,即中介变量。本文借鉴程新生等^[36]研究的做法,将专利申请总量的自然对数作为衡量企业创新活跃度的替代变量。这个数值越大,表明企业创新活跃度越高。

4. 控制变量。本文借鉴邵传林^[31]、张乃丽等^[37]研究的做法,选取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企业规模、企业年龄、资产负债率、股权集中度、资产收益率、独立董事比例等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具体各变量的解释见表 2 所示。

表 2 变量说明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计算方法
被解释变量	企业高质量发展	<i>Tfp-lp</i>	利用 LP 方法测算的全要素生产率
解释变量	营商环境	<i>Do-bus</i>	采用熵权 TOPSIS 模型基于政务环境、市场环境、法治环境、公共服务环境和对外开放环境五个维度进行综合测算
中介变量	创新活跃度	<i>Ino</i>	ln(专利申请总量)
控制变量	经济发展水平	<i>Pgdp</i>	ln(人均 GDP)
	产业结构	<i>Stru</i>	第二产业/地区生产总值
	企业规模	<i>Size</i>	ln(年末总资产)
	企业年龄	<i>Age</i>	ln(观测年份-上市年份+1)
	资产负债率	<i>Lev</i>	总负债/总资产
	股权集中度	<i>Firs</i>	第一大股东持股数/总股数
	资产收益率	<i>Roa</i>	企业净利润/平均资产总额
	独立董事比例	<i>Indep</i>	独立董事人数/董事会总人数

(三)模型构建

为了检验营商环境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本文构建如下检验模型:

$$Tfp - lp_{i,t} = \alpha_0 + \beta_1 Do - bus_{i,t} + \sum \theta_i Control_{i,t} + u_i + \delta_i + \varepsilon_{it} \quad (1)$$

式中, α_0 表示截距项; $Control_{i,t}$ 表示一组控制变量; θ_i 表示各控制变量的估计系数; ε_{it} 为随机扰动项; β_1 表示核心估计系数,若这个系数显著为正,则表示营商环境优化能够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反之则阻碍企业高质量发展。

为了检验创新活跃度在营商环境影响企业高质量发展中的中介效应,本文在模型(1)的基础上,构建如下两个模型:

$$Ino_{i,t} = \alpha_0 + \theta_1 Do - bus_{i,t} + \sum \theta_i Control_{i,t} + u_i + \delta_i + \varepsilon_{it} \quad (2)$$

$$Tfp - lp_{i,t} = \alpha_0 + \gamma_1 Do - bus_{i,t} + \varphi_1 Ino_{i,t} + \sum \theta_i Control_{i,t} + u_i + \delta_i + \varepsilon_{it} \quad (3)$$

其检验步骤包括以下 3 步:首先,若式(1)中回归系数 β_1 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则继续往下;否则,就终止。其次,若式(2)中营商环境与创新活跃度回归系数 θ_1 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则继续往下;否则,就终止。最后,若式(3)中 γ_1 和 φ_1 的回归系数都显著不为零,则说明存在部分中介效应;若 γ_1 不显著,而 φ_1 显著,则说明存在完全中介效应。

四、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 3 报告了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由此可见,全要素生产率的平均值和标准差分别为 9.132、1.083,说明样本公司高质量发展水平存在个体差异。营商环境指数的平均值为 47.980,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为 86.041、19.982,说明营商环境改进存在一定的区域差异。创新活跃度的平均值为 2.692,标准差仅为 1.928,说明现阶段我国上市公司的创新活跃度普遍较低,创新活力未被充分激发。

表 3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观测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i>Tfp-lp</i>	20 508	9.132	1.083	6.112	13.548
<i>Do-bus</i>	20 508	47.980	16.987	19.982	86.041
<i>Ino</i>	20 508	2.692	1.928	0.537	9.229
<i>Pgdp</i>	20 508	0.126	0.003	0.152	0.142
<i>Stru</i>	20 508	0.403	0.201	0.183	0.652
<i>Size</i>	20 508	22.803	1.27	19.779	26.416
<i>Age</i>	20 508	1.958	0.128	0.000	2.303
<i>Lev</i>	20 508	0.414	0.198	0.050	0.869
<i>Firs</i>	20 508	0.327	0.137	0.092	0.762
<i>Roa</i>	20 508	0.047	0.088	-1.859	0.88
<i>Indep</i>	20 508	0.378	0.056	0.1667	0.80

(二)基本回归分析

表 4 和表 5 分别反映了营商环境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以及创新活跃度在这种影响中的传导效应。其中,表 4 中(1)~(3)列反映了营商环境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采用的是逐步加入控制变量法;表 5 中的第(1)列~第(3)列反映了创新活跃度在营商环境影响企业高质量发展中的传导效应。从表 4 的第(1)列~第(3)列看,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营商环境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均在 1% 水平上显著为正,与假设 H_1 相吻合,表明政府改善营商环境对企业高质量发展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从表 5 的第(1)列~第(3)列看,营商环境对创新活跃度的影响在 1% 水平上显

表 4 营商环境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变量	列(1)	列(2)	列(3)
	<i>Tfp-lp</i>	<i>Tfp-lp</i>	<i>Tfp-lp</i>
<i>Do-bus</i>	0.075 *** (0.005)	0.053 *** (0.006)	0.052 *** (0.006)
<i>Size</i>	—	0.063 *** (0.007)	0.063 *** (0.007)
<i>Age</i>	—	-0.051 (0.032)	-0.056 * (0.032)
<i>Lev</i>	—	-0.382 *** (0.019)	-0.384 *** (0.020)
<i>Firs</i>	—	-0.154 *** (0.031)	-0.158 *** (0.032)
<i>Roa</i>	—	0.003 *** (0.001)	0.003 *** (0.001)
<i>Indep</i>	—	-0.014 (0.030)	-0.009 (0.029)
<i>Pgdp</i>	—	—	0.004 * (0.007)
<i>Stru</i>	—	—	0.002 *** (0.004)
- cons	-0.611 *** (0.049)	-1.573 *** (0.1532)	-1.546 *** (0.153)
<i>N</i>	20 508	20 508	20 508
<i>R</i> ²	0.125	0.304	0.308

注:*** 和 * 分别表示在 $p < 0.01$ 和 $p < 0.10$ 时有统计学意义;括号内为稳健性标准误。

著为正,表明政府改善营商环境能激发企业创新活力;且创新活跃度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创新活跃度对企业高质量发展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由此可见,创新活跃度在营商环境影响企业高质量发展中有着积极的传导作用,与假设H₂相吻合。

表5 创新活跃度在营商环境影响企业高质量发展中的中介效应

变量	列(1)	列(2)	列(3)
	<i>Tfp-lp</i>	<i>Ino</i>	<i>Tfp-lp</i>
<i>Do-bus</i>	0.052 *** (0.006)	0.284 *** (1.923)	0.045 *** (0.038)
<i>Ino</i>	—	—	0.075 *** (1.028)
<i>Size</i>	0.063 *** (0.007)	0.028 *** (0.192)	0.074 *** (0.382)
<i>Age</i>	-0.056 * (0.032)	0.281 * (1.203)	-0.024 * (0.201)
<i>Lev</i>	-0.384 *** (0.020)	-0.293 ** (0.290)	-0.279 *** (0.482)
<i>Firs</i>	-0.158 *** (0.032)	-0.280 (0.213)	-0.028 *** (0.193)
<i>Roa</i>	0.003 *** (0.001)	0.022 *** (0.002)	0.002 *** (0.028)
<i>Indep</i>	-0.009 (0.029)	-0.290 (0.190)	-0.029 (0.291)
<i>Pgdp</i>	0.004 * (0.007)	0.012 * (0.021)	0.073 * (0.028)
<i>Stru</i>	0.002 *** (0.004)	0.103 (0.289)	0.017 *** (0.075)
-cons	-1.546 *** (0.153)	-2.19 *** (0.298)	-1.298 *** (0.028)
<i>N</i>	20 508	20 508	20 508
<i>R</i> ²	0.308	0.542	0.572

注:***、**和*分别表示在 $p < 0.01$ 、 $p < 0.05$ 和 $p < 0.10$ 时有统计学意义;括号内为稳健性标准误。

(三)进一步分析

为了进一步增强上述基本回归结果的说服力,本章节将对基本回归的结果从如下几个方面做进一步分析。

1. 创新活跃度中介效应的分类讨论。考虑到用专利申请总量的自然对数作为创新活跃度的替代变量,而专利总量是由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构成,因此本文进一步考察了这3类不同专利在营商环境影响企业高质量发展中的传导效应,如表6所示。由表6可见,在营商环境影响企业高质量发展中,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均有着显著的传导效应,而外观设计专利的传导效应则不显著。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企业的技术创新存在着一定的质量问题。

表6 营商环境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中介效应检验

变量	发明专利的中介效应		实用新型专利的中介效应		外观设计专利的中介效应	
	<i>Ino</i>	<i>Tfp-lp</i>	<i>Ino</i>	<i>Tfp-lp</i>	<i>Ino</i>	<i>Tfp-lp</i>
<i>Do-bus</i>	0.420 *** (0.482)	0.038 *** (0.182)	0.208 ** (0.101)	0.019 ** (0.082)	0.367 (0.082)	0.421 (0.193)
<i>Ino</i>	—	0.072 *** (0.095)	—	0.012 ** (0.223)	—	0.009 (0.167)
<i>Size</i>	0.019 *** (0.190)	0.085 *** (0.139)	0.037 *** (0.394)	0.183 *** (0.482)	0.097 *** (0.193)	0.078 *** (0.382)
<i>Age</i>	0.103 (1.931)	-0.038 (0.382)	0.294 * (0.183)	-0.383 * (0.284)	0.922 (0.031)	-1.39 (0.028)
<i>Lev</i>	-0.289 *** (0.023)	-0.193 *** (0.046)	-0.392 * (0.214)	-0.284 * (0.316)	-0.654 (0.274)	-0.825 (0.36)
<i>Firs</i>	-0.297 *** (0.273)	-0.302 *** (0.372)	-0.286 ** (0.263)	-0.367 ** (0.153)	-0.862 (0.372)	-0.289 (0.262)
<i>Roa</i>	0.027 *** (0.002)	0.017 *** (0.056)	0.046 *** (0.028)	0.026 *** (0.026)	0.025 *** (0.025)	0.020 *** (0.023)
<i>Indep</i>	-0.296 (0.283)	-0.278 (0.264)	-0.025 (0.153)	-0.048 (0.273)	-0.033 (0.023)	-0.036 (0.262)
<i>Pgdp</i>	0.027 * (0.324)	0.036 * (0.362)	0.284 * (0.063)	0.028 * (0.036)	0.087 * (0.063)	0.062 * (0.036)
<i>Stru</i>	0.005 * (0.134)	0.019 * (0.063)	0.020 * (0.026)	0.025 * (0.026)	0.027 * (0.019)	0.062 * (0.002)
-cons	-1.380 *** (0.027)	-1.937 *** (0.07)	-1.837 *** (0.396)	-1.960 *** (0.396)	-1.386 *** (0.063)	-0.826 *** (0.372)
<i>N</i>	19 829	19 829	20 326	20 326	20 017	20 017
<i>R</i> ²	0.482	0.501	0.394	0.420	0.409	0.497

注:***、**和*分别表示在 $p < 0.01$ 、 $p < 0.05$ 和 $p < 0.10$ 时有统计学意义;括号内为稳健性标准误。

2. 营商环境的结构性分析。考虑到营商环境是由政务环境、市场环境、法治环境、公共服务环境和对外开放环境五部分构成,因此本文进一步分别考察了这五部分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由表7可见,政务环境、市场环境、法治环境和对外开放环境均对企业高质量发展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公共服务环境对企业高质量发展有正向影响,但不显著。

表7 营商环境各维度与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变量	<i>Tfp-lp</i>				
	列(1)	列(2)	列(3)	列(4)	列(5)
<i>Government</i>	0.918 *** (0.028)	—	—	—	—
<i>Market</i>	—	1.837 *** (0.012)	—	—	—
<i>Law</i>	—	—	0.785 ** (0.083)	—	—
<i>Public</i>	—	—	—	0.027 (0.021)	—
<i>Opening</i>	—	—	—	—	0.628 ** (0.390)
-cons	-1.392 *** (0.014)	-0.105 *** (0.433)	-0.291 *** (0.103)	-0.963 *** (0.163)	-1.303 *** (0.097)
Control Variables	Yes	No	Yes	Yes	Yes
<i>R</i> ²	0.512	0.436	0.491	0.388	0.492

注:***、**和*分别表示在 $p < 0.01$ 、 $p < 0.05$ 和 $p < 0.10$ 时有统计学意义;括号内为稳健性标准误。

3. 区域异质性分析。考虑到各地区营商环境存在一定的差异性^[38],因此本文进一步按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分别考察其营商环境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如表8所示。由表8显

示,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营商环境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分别在 1% 和 5% 水平上显著,表明这两个地区的营商环境促进了企业高质量发展;而西部地区的营商环境对企业高质量发展有正向影响,但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西部地区的交通不便、自然条件较差、财政收入不高等原因所致。组间系数差异检验的 p 值分别为 0.014 和 0.033,在 5% 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综合上述表明,相较于西部地区,政府优化营商环境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在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更为明显。

表 8 各地区营商环境与企业高质量发展

变量	$Tfp-lp$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Do-bus$	0.037 *** (0.012)	0.016 ** (0.013)	0.004 (0.31)	0.041 *** (0.004)	0.024 ** (0.007)	0.016 (0.021)
$-cons$	-0.101 *** (0.002)	-0.535 ** (0.192)	-2.052 ** (0.436)	-0.215 *** (0.024)	-0.959 ** (0.294)	-3.701 ** (0.855)
Control Variables	No	No	No	Yes	Yes	Yes
R^2	0.083	0.201	0.304	0.132	0.315	0.492
检验 p 值	0.014 **			0.033 **		

注:***、** 分别表示在 $p < 0.01$ 、 $p < 0.05$ 时有统计学意义;括号内为稳健性标准误。检验 p 值用于检验组间系数差异的显著性,通过自助抽样 1 000 次得到。

4. 产权异质性分析。考虑到目前我国资本市场存在国有和非国有控股两类不同产权性质的公司,它们在公司治理等方面均存在着一定的差异^[39],因此本文进一步考察营商环境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在这两类不同产权性质的公司中是否存在差异,如表 9 所示。由表 9 可见,营商环境对民营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均在 1% 水平上正向显著,而营商环境对国有控股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有正向影响,但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相对于民营上市公司而言,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与政府关系更密切,更易获取制度红利和要素资源,从而与营商环境的敏感性较弱。组间系数差异检验的 p 值分别为 0.027 和 0.016,在 5% 水平上通

表 9 不同产权性质下营商环境与企业高质量发展

变量	$Tfp-lp$			
	国有企业	民营企业	国有企业	民营企业
$Do-bus$	0.206 (0.117)	0.068 *** (0.094)	0.101 (0.083)	0.020 *** (0.021)
$-cons$	-1.032 *** (0.023)	-1.753 *** (0.840)	-0.405 *** (0.004)	-0.171 *** (0.073)
Control Variables	No	No	Yes	Yes
R^2	0.106	0.206	0.302	0.302
检验 p 值	0.027 **		0.016 **	

注:***、** 分别表示在 $p < 0.01$ 、 $p < 0.05$ 时有统计学意义;括号内为稳健性标准误。检验 p 值用于检验组间系数差异的显著性,通过自助抽样 1 000 次得到。

过显著性检验。综合表明,相较于国有控股企业,政府优化营商环境对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更强。

五、稳健性检验

为验证以上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本文从内生性控制和稳健性检验两方面加以检验。

(一) 内生性控制

考虑到营商环境与企业高质量发展之间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因此本文采取如下两种方式进行内生性检验:一是由于营商环境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可能存在滞后性问题,因此使用营商环境的滞后一期 $L.Tfp-lp$ 代替其当期值,重新进行基准回归;二是参考已有研究^[40]的做法,使用各省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作为工具变量,并利用 2SLS 方法进行估计。选择各省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作为工具变量的理由是,这个变量可以反映地方政府对公共服务的重视程度,同时这个变量与企业发展质量也不存在直接联系,因此这个变量能够满足工具变量所要求的相关性和外生性。

(二) 稳健性检验

1. 替换被解释变量。采用 OP 法计算的全要素生产率($Tfp-op$)替代采用 LP 法计算的全要素生产率($Tfp-lp$)。

2. 调整样本期。考虑到 2020 年企业高质量发展会受到疫情的影响,将样本期从 2013—2022 年调整至 2013—2019 年。

上述内生性检验和稳健性检验的结果如表 10 所示。由表 10 可见,其结果和表 4 中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基本一致,表明前文研究的结论是可靠的。

六、研究结论与政策意义

(一) 研究结论

本文研究结果表明:政府改善营商环境有助于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创新活跃度在营商环境影响企业高质量发展中能够起到积极的传导作用。进一步分析发现: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均有着显著的传导效应,而外观设计专利的传导效应则不显著;政务环境、市场环境、法治环境和对外开放环境均对企业高质量发展有着显著的正

表 10 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滞后一期		工具变量		替换被解释变量		调整样本期	
<i>Do - bus</i>	0.043 *** (0.029)	0.012 *** (0.018)	0.052 *** (0.031)	0.039 *** (0.028)	0.041 *** (0.003)	0.052 *** (0.002)	0.012 *** (0.078)	0.036 *** (0.042)
<i>- cons</i>	-0.528 *** (0.018)	-0.493 *** (0.192)	-1.298 *** (0.019)	-2.196 *** (0.218)	-0.102 *** (0.016)	-0.211 *** (0.035)	-1.298 *** (0.019)	-2.196 *** (0.218)
<i>Control Variables</i>	Yes	No	Yes	No	Yes	No	Yes	No
<i>R²</i>	0.281	0.192	0.382	0.101	0.329	0.201	0.282	0.145

注: *** 表示在 $p < 0.01$ 时有统计学意义;括号内为稳健性标准误。

向影响,而公共服务环境对企业高质量发展有正向影响,但不显著;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营商环境对企业高质量发展均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而西部地区的营商环境对企业高质量发展有正向影响,但不显著;营商环境对民营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而营商环境对国有控股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有正向影响,但不显著。这些研究结论对政府改善营商环境,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

(二)政策意义

一是政府要不断改善营商环境。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深化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建立起在资源配置中更好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和政府调控作用的制度环境,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在现有改革的基础上,今后一段时间我国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主旨,就是要创新政府管理方式,建设人民满意的廉洁高效服务型政府^[41]。也就是要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行政管理体制^[42]。具体来说,一方面要在简政放权、优化组织结构、改进运行方式、完善制度机制、反腐倡廉、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政府职能等方面深化政府自身改革;另一方面要在坚持基本经济制度,放宽市场准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创新宏观调控方式及手段、加强市场监管、优化经济结构等方面深化经济与市场改革。

二是企业要切实推动技术创新。在完善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新型举国体制的同时,企业要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尤其要在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方面多下功夫。采取建立产学研相结合创新体系、塑造企业间高效协同创新格局、推动创新

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创新机制等举措,提高技术创新质量,增强产业链竞争力,实现高质量发展。

三是地区要推动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这是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对区域经济发展提出的新要求。为了适应这一要求,各地区至少要在如下两个方面采取措施:一是要按照经济规律,完善区域营商环境,以提供制度保障;二是要尊重科学规律,建立科技创新体系,以提供科技支撑。

参考文献:

- [1]贺大兴,王静.营商环境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与实证研究[J].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学报,2020,27(6):51-62.
- [2]张曾莲,孟苗苗.营商环境、科技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对外开放调节效应的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J].宏观质量研究,2022,10(2):100-112.
- [3]夏后学,谭清美,白俊红.营商环境、企业寻租与市场创新:来自中国企业营商环境调查的经验证据[J].经济研究,2019,54(4):84-98.
- [4]白洁,李万明.创新型城市建设、营商环境与城市创业[J].软科学,2022,36(9):29-36.
- [5]BAH E H, FANG L. Impact of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on output and productivity in Africa [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15(114):159-171.
- [6]李园园,张广胜.营商环境对不同所有制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J].科学决策,2022(10):20-32.
- [7]江艇.因果推断经验研究中的中介效应与调节效应[J].中国工业经济,2022(5):100-120.
- [8]“中国城市营商环境评价研究”课题组,李志军,张世国,等.中国城市营商环境评价的理论逻辑、比较分析及对策建议[J].管理世界,2021,37(5):98-112,8.
- [9]邱康权,陈静,吕雁琴.中国营商环境综合发展水平的测度、地区差异与动态演变研究[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2,39(2):121-143.

- [10]王治,陈曦. 数字经济,营商环境与企业家精神:基于“智慧城市”的准自然实验[J]. 科学决策,2023(6):92-116.
- [11]弗鲁博顿,芮切特. 新制度经济学:一个交易费用分析范式[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 [12]吴一平,王健. 制度环境、政治网络与创业:来自转型国家的证据[J]. 经济研究,2015,50(8):45-57.
- [13]高翔,独旭. 政府补贴、政府治理能力与出口企业风险承担[J]. 财贸研究,2017,28(12):47-60.
- [14]陈晓红,王思颖,杨立. 变革型领导行为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基于我国中小企业领导人的问卷调查[J].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2,33(11):160-171.
- [15]许和连,王海成. 简政放权改革会改善企业出口绩效吗?:基于出口退(免)税审批权下放的准自然试验[J]. 经济研究,2018,53(3):157-170.
- [16]LA PORTA R, LOPE-De-SILANES F, SHLEIFER A. Corporate ownership around the world[J]. The journal of finance,1999,54(2):471-517.
- [17]DOLLAR D, KRAAY A. Institutions, trade, and growth[J].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2003,50(1):133-162.
- [18]陈德球,李思飞. 政府治理、产权偏好与资本投资[J]. 南开管理评论,2012,15(1):43-53.
- [19]焦豪,焦捷,刘瑞明. 政府质量、公司治理结构与投资决策:基于世界银行企业调查数据的经验研究[J]. 管理世界,2017(10):66-78.
- [20]STEIN J C. Agency, information and corporate investment[J]. Handbook of the economics of finance, 2003(1):111-165.
- [21]李雪,冯政. 宽松货币政策下我国企业的风险承担[J]. 财经科学,2015(9):25-34.
- [22]刘常建,许为宾,周莉莉. 重商文化、政府治理与企业风险承担[J]. 东岳论丛,2019,40(11):141-149.
- [23]CHEN J, LIU Y, LIU W. Investment facilitation and China's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long the belt and road[J].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20(61):101458.
- [24]梁平汉,赵玉兰. 激励相容视角下亲清政商关系的全面构建:一个集体行动分析框架[J]. 广东财经大学学报,2023,38(2):75-87.
- [25]李拯非,张宏. 营商环境改革背景下减税降费对小微企业创新的影响:基于混合横截面数据的经验证据[J]. 江西社会科学,2021,41(7):33-45.
- [26]徐浩,张美莎. 营商环境、关系型融资与技术创新. 当代财经,2019(12):73-83.
- [27]刘娟,唐加福. 营商环境、投资承载力与企业投资效率: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J]. 管理科学学报,2022,25(4):88-106.
- [28]ROMER P M. Endogenous technological change[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0,98(5):71-102.
- [29]夏杰长.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J]. 改革,2022(10):1-11.
- [30]蒋园园,吴琰琰. 审计质量、企业声誉与企业高质量发展[J]. 科学决策,2023(8):98-112.
- [31]邵传林. 地区营商环境与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J]. 经济与管理研究,2021,42(9):42-61.
- [32]陈丽珊,傅元海. 融资约束条件下技术创新影响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动态特征[J]. 中国软科学,2019(12):108-128.
- [33]李小青,何玮萱. 数字化创新、营商环境与企业高质量发展: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22,43(11):56-77.
- [34]王小华,宋檬,和杨亦兰. 金融科技、金融监管与企业高质量发展[J]. 财经问题研究,2023(4):87-99.
- [35]李志军. 我国城市营商环境的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及其南北差异分析[J]. 改革,2022(2):36-47.
- [36]程新生,赵旸. 权威董事专业性、高管激励与创新活跃度研究[J]. 管理科学学报,2019,22(3):40-52.
- [37]张乃丽,马荣国. 营商环境优化对制造业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J]. 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33(1):87-100.
- [38]张三保,康璧成,张志学. 中国省份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与量化分析[J]. 经济管理,2020,42(4):5-19.
- [39]张兆国,曹丹婷,向首任. 制度背景、董事长任期与企业技术创新绩效[J]. 中国软科学,2017(10):114-127.
- [40]周泽将,雷玲,伞子瑶. 营商环境与企业高质量发展:基于公司治理视角的机制分析[J]. 财政研究,2022(5):111-129.
- [41]陈宗胜,王晓云,周云波.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成: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四十年回顾与展望[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8(4):24-41.
- [42]新华社. “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EB/OL]. http://www.gov.cn/xinwen/2018-03/17/content_5275116.htm.

(本文责编:默 黎)